

(日)片山智行/著  
李冬木/译

鲁迅  
《野草》

全

释

吉林大学出版社

# 鲁迅《野草》全释

(日)片山智行 著  
李 冬木 译

吉林大学出版社

**鲁迅《野草》全释**

(日)片山智行 著

李 冬木 译

---

责任编辑:王大椿

封面设计:张沐沉

---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东中华路 29 号)

吉林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印张:5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22 千字

印数:1—(平)400 (精)100 册

---

ISBN 7-5601-1384-2/1·64

定价:(平)2.80 元

(精)4.00 元

|     |                 |       |
|-----|-----------------|-------|
| 目 录 | 中文版序 .....      | ( 1 ) |
|     | 题辞 .....        | ( 4 ) |
|     | 秋夜 .....        | (1 3) |
|     | 影的告别 .....      | (2 0) |
|     | 求乞者 .....       | (2 6) |
|     | 我的失恋 .....      | (2 9) |
|     | 复仇 .....        | (3 2) |
|     | 复仇(其二) .....    | (3 7) |
|     | 希望 .....        | (4 2) |
|     | 雪 .....         | (5 5) |
|     | 风筝 .....        | (5 8) |
|     | 好的故事 .....      | (6 1) |
|     | 过客 .....        | (6 4) |
|     | 死火 .....        | (7 0) |
|     | 狗的驳诘 .....      | (7 3) |
|     | 失掉的好地狱 .....    | (7 6) |
|     | 墓碣文 .....       | (8 0) |
|     | 颓败线的颤动 .....    | (8 7) |
|     | 立论 .....        | (9 4) |
|     | 死后 .....        | (9 7) |
|     | 这样的战士 .....     | (9 9) |
|     |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 | (105) |
|     | 腊叶 .....        | (108) |
|     | 淡淡的血痕中 .....    | (111) |
|     | 一觉 .....        | (115) |
|     | 《野草》论 .....     | (119) |
|     | 后记 .....        | (149) |
|     | 译后小记 .....      | (154) |

# 中文版序

(日) 片山智行

我在自己的上一本书——《鲁迅的现实主义》(1985年)里说了下面的一段话。这段话所表达的想法，至今仍没有改变，今后也不会改变。谨以此为中文版序。

“鲁迅憎恶‘虚伪’，并且憎恶一切助长‘虚伪’的东西，他认为‘虚伪’在中国社会尤其乌烟瘴气地弥漫着。所谓的‘马马虎虎’就是如此。鲁迅把这视为中国民族的最大‘病根’。他在《阿Q正传》中描写了这一点，后来也同内山完造谈到了这一点：

老板，我在这三个月的休养期间做了充分的思考。中国四亿民众正害着一场大病，而且其病源就是你所知道的马马虎虎，即怎么弄都行的不认真的生活态度。当然，在变到今天的不认真的生活态度之前，自然有着既可同情又可愤慨的路程的。但因此也就不能肯定今天的这种不认真的生活态度。……（内山完造《追忆鲁迅先生》1936年）

也许是听鲁迅讲这段话时留下的印象很深，或者是多次听到这样的话，内山在两年后的座谈会上仍予以提及。鲁迅在东京留学时代就和许寿裳讨论过中国民族的‘国民性’、‘病根’问题，经过长年的经验、观察和斗争，最后所概括出的就是‘马马虎虎’这句话（从并不可憎的阿Q的‘马马虎虎’，到潜藏在成为封建统治体制核心的儒教当中的狡猾的‘马马虎虎’〔‘礼教吃人’〕，我打算以这个词来表现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所有虚伪以及造成这种虚伪的土壤）。在鲁迅看来，中国社会的种种‘马马虎虎’，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支撑着统治体制。他青年时代怀着莫大的期待迎来的辛亥革命也不例外。‘民国’虽有民国之名，

但决不是‘民’之国，而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军阀专制之国。对理当愤慨的状况，民众仍不‘自觉’地活得‘马马虎虎’（这和‘幻灯事件’中，‘面目麻木’地去看自己的同胞被日军杀头的民众是重合的）。鲁迅不相信在克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方面都存在的‘马马虎虎’以前会有革命的成功。

既然是人，便总有‘马马虎虎’，稍有不慎，甚至会出现现在革命阵营当中。鲁迅虽知是同一阵营，但在‘革命文学论争’和‘国防文学论战’中，鲁迅却以激烈的言词，进行了看上去异常猛烈的非妥协的斗争，也正是因为他担心革命被‘马马虎虎’所吞噬。鲁迅的激烈和‘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不该只归结为他性格上的原因，而应该认为是对中国革命认识的深刻（如果不克服以‘礼教吃人’为代表的甚至存在于革命阵营内部的中国社会的‘马马虎虎’，革命便不会成功的革命认识）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在残酷的政治现实当中，大批像鲁迅的同志、友人及学生们流血的沉重，进一步深化了鲁迅的现实主义。他的不为‘墨写的谎说’（‘名’）所欺骗的现实主义，也正是建立在如此沉痛的事实基础上的。

进而还要补充的是，鲁迅并未背对着‘自在’的民众，而是清醒地看到了他们并不‘觉得’孔子是‘圣人’的健康的心灵。在鲁迅看来，‘民众’问题和中国革命往往是不可分割的互为表里的问题。‘朴素之民’、‘阿Q’、有着‘狼眼睛’的看客、‘中国的愚民’。鲁迅总是在各种情况下，亦爱亦憎，观察捕捉着民众排除了潜藏着的‘无限能量’的有如巨大的‘阿米巴’（变形单细胞动物）的民众，中国革命便不会成功。而且，离开了这个问题，也就无法讨论鲁迅的革命和文学。比如，满脑子都浸透了陈腐思想的阿Q，一旦知道有革命党来，连‘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都害怕，便也认为‘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从这一点上可以说，阿Q正确反映了有如巨大‘阿米

巴’一般的民众身上潜藏着的本质的东西，是极其出色的典型形象。

总之，鲁迅把打着‘名’的旗号的‘马马虎虎’视作中国（民族）的死敌。他是终生与之战斗的文学者（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根深蒂固的‘马马虎虎’，其核心正是统治者用作‘统治工具’的儒教。鲁迅揭发了‘马马虎虎’的‘僵尸统治’，而我注意到‘鲁迅的现实主义’这一‘本领’，则是在调查了鲁迅怎样批判儒教之后）。鲁迅文学之所以今天仍有意义，就是因为即使在经历了‘革命’的中国，仍存在着没有完全克服‘僵尸’跳梁的‘马马虎虎’的现实。‘革命’决不是一种以夺取政权而终的政治上的现象。

因此，即使主张的是‘革命’、‘解放’、‘正义’，如果其人安然于招牌（‘名’），便会即刻堕落。鲁迅时常严厉警告的正是这个问题。不检认自己的行为是否‘名’符其实，而只是依仗其‘名’，便肯定会堕入到‘马马虎虎’的‘僵尸统治’。即‘正义的堕落’由此而始。打着‘名’的旗号的‘马马虎虎’，是可能出现在任何政党组织、运动组织、宗教组织和社会组织当中的最凶恶的敌人。因此，不能不说逼使对此予以检认的鲁迅的现实主义，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宝贵的精神。

鲁迅写下了各种各样的文章，其根基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他总是排斥‘马马虎虎’，注重事实，不丢透视‘名’之渊藪的现实主义。正因为是这样，鲁迅的现实主义（这是在——具体地或创造性地描写、论述政治上的、社会上的、文化上的和日常性真实的鲁迅文章的积淀中我们所能把握到的）才能经受政治的波涛而生命力延续至今。不论是在经历了‘革命’的中国还是在日本，鲁迅的现实主义，今后仍将放射着强烈的光芒，仍将发挥威力，仍将完成新的使命。”

1992年12月2日

# 题 辞

《题辞》是《野草》二十三篇全部写完后，大约经过一年的时间完成的。在紧张的政治状况中写成的这篇文章，浓缩着作者的思绪，几乎总括着《野草》的全部作品以及作者的内心世界。

四月二十六日这个日期，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的半个月后。在鲁迅的记忆里，还残存着对凄惨的血腥镇压的浓重悲愤吧。抛开这个问题，本篇《题辞》是难以读懂的。

“四·一二”政变，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爆发，4月15日波及到了广东。曾实行国共合作路线的国民党，突然转向，对共产党进行镇压。

在广东，钱大钧手下的戒严部队，袭击了工会、共产党及其他革命团体的办事机构，逮捕、杀害了为数众多的共产党员、工人和学生。据说当时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工人在两千名以上，另有两千多名铁路工人被驱逐。中山大学亦有四十几名学生被捕。

当时，担任中山大学文科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鲁迅，出席了由各系主任参加的紧急会议，并且力主学校应尽力救援被捕学生。但鲁迅的主张未被采纳，据说，他当晚茶饭未进，不说一句话。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武装军队的搜捕业已开始，在残暴的武力镇压面前，中山大学少数教授们的呼声，几乎没起什么作用。

4月18日，曾与鲁迅往来的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员毕磊被捕了（后来，鲁迅还暗中写了悼念他的文章）。据鲁迅日记，此时的悲愤和不安，使鲁迅夜难成寐。

鲁迅不满于大学当局的举措，亦感到个人的力量有限，便于4月21日辞去了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此后，中山大学当局虽多次挽留，但他辞意未改。

在这种悲惨暗淡的状况里，鲁迅编辑了《野草》各篇，并写成了这篇《题辞》。

“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作者在《题辞》开头里说的这番话，暗中提示了一个难以名状的内面世界的深渊。孙玉石就刚才涉及到的当时中国的情况做了以下说明：

在当时“杀人如草不闻声”的黑暗日子里，一个革命者无法表达自己内心愤怒的感情。在无言的沉默中，回顾过去呕血战斗的生活，会感到一种欣慰和满意；想想现在目不忍睹的惨象，也有一肚子仇恨和怒火，即使是无法诉诸语言吧，这总还是令人有一种充实的感觉。但是，倘要一开口，在那种环境里怎么能说真话呢？而在那个极度痛苦的时候，内心忧愤的千言万语，又从何说起呢？这样开口，自然不免产生一种空虚之感（孙玉石《〈野草〉研究》1982年）

这是可以充分认同的解释吧。作者眼前呈现的语言所难以尽述的极其令人绝望的悲剧现实，是解释这篇作品时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要素。

鲁迅自己在写完《题辞》近半年后的另一篇文章里说的一段话，也和孙的解释一样，使问题进一步普遍化了。

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怎么写》1927

写作这篇文章的大约前一年，作者在厦门，一个人曾住在厦门大学图书馆楼上的房间里。这篇文章就是回顾他在夜里一个人眺望着外界，心绪沉重的情形。与此相关，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说明多少是有些晦涩的。

一个人眺望着黑夜的窗外，回想着那些“无量的悲哀、苦恼、零落、死灭”，作者被带进了一种微醉的状态。此时的作者，恐怕是记起了那种“充实”吧，然而，一旦要将其表现出来，便即刻感到“空虚”。

作者把文章写到这里，便以产生了莫非这就是“世界苦恼”的疑问。“世界苦恼”是奥地利诗人莱瑙(Nikolaus Lenau 1802年——1850年)的话，他认为“世界充满了苦恼，而创作就由这苦恼中产生”(作者三年前曾翻译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介绍过这一主张)。作家鲁迅当然会不时地咀嚼到存在渊底里的苦恼，即“世界苦恼”。

总而言之，在写作《〈野草〉题辞》的时候，鲁迅自身处在国民党独裁政权实行血腥镇压的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直视着自己的生存本身，亦把这个问题予以普遍化，并且表现为“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从“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一句往下，诚如孙玉石对作者思想转变侧面的强调，不能不说“不断否定自己的过去，同世界观中旧的东西实行决裂，是一个永远前进的革命战士最可宝贵的精神”。

但从贯穿《野草》全篇的基调来讲，这个部分的解释，作为不惜牺牲自己的鲁迅式的“进化论”的一种表现来接受更为恰当吧。“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下一代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对于冀望于此的鲁迅来说，“死亡”、“腐朽”的本身并不可悲，而耕耘的土地能否收获则是

问题。倘若自己的“死亡”和“腐朽”能换来收获，能对下一代有益，这便可带来“大欢喜”。附带说明，“大欢喜”的“大”系佛教经典的汉译用词，象“大权力”、“大音乐”等在《失掉的好地狱》和其他作品中也被使用。

“腐朽”之所以不是“空虚”，只是因为“腐朽”意味着滋养下一代。即使是“死亡”，反过来说，其前提便意味着“生存”。如此推论，就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死亡”中寻找否定的意义。我们可以把这种正话反说的表现，整体看作老子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以来的传统的影响（包括其中对句的形式）。然而给予作者更大影响的则是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吧。老子也好，尼采也好，他们在否定儒教和基督教的“大权威”时，经常是正话反说的方式。而在反抗儒教权威（坚固的旧体制）的鲁迅身上，亦可略微看到如此倾向。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生命的泥”，使人想起了《补天》（1921年）里出现的女娲（中国上古传说中的女神）取土造人的事。这里说的“生命的泥”，亦暗示着死去的生命换取收获吧。鲁迅“生命的泥”，此时萌生了他自身的野草（虽然他谦逊地不称之为“乔木”）。胎生于“有着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旧中国“吃人”社会的作者，自觉到了那内部的血污（原罪）。作者之所以不惜自己的“死亡”和“腐朽”，恐怕与此不无关系。“这是我的罪过”一句里的“罪过”，同作者的“原罪”有着微妙的共鸣”。

“野草”如同“草莽”之民，没什么可夸耀的，但却各自活得兴旺，“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生长着。尽管“将遭踏践，将遭删刈”，却坚毅地去活、去死。

“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这恐怕是对鱼肉草莽之民的现实政治体制的不满吧。

作者并不惧怕“野草”的“死灭”和“腐朽”。相反，正因

为对此抱有积极的意向，才欣然地接受“死灭”和“腐朽”，甚至说，“我坦然，欣然”。对于待望新世界出现的作者来说，个体的死并不是绝对的。

《题辞》写作的五个月前，鲁迅把自己看作旧时代转为新时代的“过渡期的人”，做了如下的表述：

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致强敌的致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跟着起来便该不同了，……（《写在〈坟〉后面》1926年）

过渡期的人，倘“反戈”旧社会（旧体制），对旧社会的事情洞若观火，“易致强敌的致命”。的确，写下《狂人日记》，揭露“礼教吃人”<sup>〔1〕</sup>的鲁迅，就是这种旧社会掘墓人的代表。

但是，强烈具有“进化论”观念的鲁迅，并不认为自己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而是认为，“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作者之所以一方面知道“死灭”和“腐朽”行将到来，一方面又坦然地说“我坦然，欣然”，就是因为有鲁迅式“进化论”的那种“过渡期的人”的精神准备和气概的缘故。

正如开头所述，《题辞》是于凄惨的反共政变的半个月后写成的。考虑进这一点，那么“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一节，便恐怕是绝尽我们想象的意味深长的发言吧，因为作者是在国民党独裁政权的残暴镇压下，是在还弥漫着血腥空气的恐怖的政治环境中讲这番话的，它简直意味着对新出现的“地狱”支配者的挑战。在惨无人道的血腥整肃尚在进行的状况下，作者高呼“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只

能意味着作者在隐晦地表达对残暴压迫的决不屈服的决心。(三个月后，鲁迅做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实际是巧妙而隐晦地表达了一步也不退缩的决心。当时，鲁迅讽刺强行于反共政变的蒋介石，假“革命”之“名”行与革命无缘之实，与“礼教吃人”如出一辙)。后来，在《野草》出版之际，国民党检查机关要求删除《题辞》，比什么都能更有力的证明这件事。

反动势力残暴镇压的狂澜凶猛之时，肯定是新势力（觉醒的民众）张扬自身力量之日。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这简直是一种预感。把它说成作者的“预言”大概不会有错吧。作者并不是在革命形势高昂的情况下做的“预言”，而是在残酷的镇压尚在进行的最为险恶政治环境里感觉到了“地火在地下运行”，并且勇敢地将其阐发出来。这是意味深长的。顺便要提到，后来（1934年），在日本军队控制“满洲”，国民党独裁政权统治中国的情势下，鲁迅写了七言绝句《无题》，也强调“于无声处听惊雷”。“地火”的“奔突”和“熔岩”的“喷出”，在这里也被预感到了。对他的坚韧的精神力量（确信），我们不能不脱帽致敬。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

可以认为，文章的前半部分是讲在国民党独裁政权的淫威下写《题辞》的状态。“四·一二政变”刚过，受镇压的一侧，当然是无法做声的。所谓“静穆”，一定是就此而言的。

而且，作者冷静地认为，在“熔岩”喷发，“天地”不再“静穆”之时，“歌唱”的是新势力，而完成了任务的“过渡期的人”——自己却或许没了歌唱。

“熔岩”“喷出”之际，作者自己的“野草”却被烧尽了。过渡期的人（作品），是“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的存在，当然

要被烧尽的。作者知道在自己有存在必要的阶段里，是无法完成新旧交替的，因此宁肯“野草”的被烧尽。到了不再需要自己，即“野草”“死亡”“腐朽”化作肥料之时，新势力（“觉醒”的民众）才会成长起来。正因为如此，作者才“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腐朽，火速到来”。

鲁迅自己就这一点做过如下的表述：

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球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热风”题记》1925年）

白血球攻击病毒，自己化做浓水，同归于尽地纠缠病毒，直到把病毒排除体外不罢休。作者也要自己的“野草”象这白血球一样的“死亡”。

《野草》全篇当然是以打破黑暗的作者的“反抗”之声为主调的。但同时不能否认，作者内心的“虚无”、“寂寞”、“颓唐”亦时有隐现。他在努力地克服“内心的矛盾”，但这又并不容易。考虑到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作者并不是单纯一方的奉献自己的作品，而是“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但不管怎样，这是矛盾的说法，直至献给“仇”、“兽”、“不爱者”的意思并不容易完全理解。这篇文章所见到的如此矛盾的说法，在《野草》的其他作品中也时时出现，令人费解。然而这恐怕和作者青年时代满怀热情写下的“恶魔派诗人论”中的内容不无关系吧。

这里仅举作者论拜伦的一段为例：

由是观之，裴伦既喜拿破仑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既心仪海贼之横行，亦孤援希腊之独立，压制反抗，兼以一人矣。虽然，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摩罗

青年时代的作者，把拜伦和撒旦都同样看成是“矛盾”着的（压制和反抗）“行动”的“超人”，并对哥德的“若夫纯洁之云，道德之云，吾人何问焉”的拜伦观表示赞赏<sup>(2)</sup>。在对《野草》的解释中，如果不考虑“存在先立于本质”意义上的存在主义理念，恐怕是很难切近作者灵魂深处的（于此相关，也可考虑到厨川白村介绍的认为“不断寻求自由和解放的生命力”乃是“人类生活之根本”的《生命哲学》的影响）。

后来，作者主张文人（人）应明“是非”，别“爱憎”。他写道：

不过我在这里，并非主张文人应该傲慢，或不妨傲慢，只是说，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只有和事老。但这不随和却又并非回避，只是唱着所是，颂这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再论〈文人相轻〉》1935年）

由此可知，作者并没把“仇”看成一定要回避的存在。据说，鲁迅留学日本的青年时代，很喜欢读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此种理念，可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看到。

单凭某个侧面无法理解的《野草》作品的难解之处，倘参考进这一点，便可接近理解了。

对“献给友与仇、人与兽、爱者和不爱者之前作证”的解释，从这一点出发也不难理解了。

此外，在“三·一八事件”中许多学生被政府军杀害的时候，作者所说的“以我的最大的悲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

意于我的痛苦”（《纪念刘和珍君》1926年），在与此种表现相近的意义上可以作为参考的吧。

最后，作者再次企愿“野草”的“死灭”和“腐朽”。这正是再次确认了以自己的“死亡”和“腐朽”来祈愿新势力成长的作者的愿望（鲁迅的《进化论》）。

最后一节的“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极端的表现了这一点。这不仅用反语阐明了作者对新时代到来的热切期待，同时也以此鲜明突现了《野草》全文的主题。

## 注释

- （1）“礼教吃人”道破了“孝”、“节”等作为儒教道德实体的吃人本质。维持“人吃人”的中国旧社会的，正是以儒教为支柱的封建体制。也就是说，中国历代王朝鼓励一有时也强制推行一三纲五常（君臣之道、父子之道、夫妻之道以及仁、义、理、智、信），构筑和统治了“人吃人”的非人的社会。《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如同惊叫“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一样，暴露了“礼教”实际上的“吃人”作用。“礼教吃人”在中国最典型最恶劣的表现，可说是宣称“名”的“马马虎虎”（即“瞒”和“骗”）。

代表“礼教吃人”的“马马虎虎”，是本书的关键用语。从联苏容共路线的国共合作一而转为血腥屠杀的“四·一二政变”，在鲁迅看来，亦可以是相当恶劣的“马马虎虎”。

- （2）关于这一点，增田涉在《鲁迅印象》（1948年）里的一段话可作参考。“他最爱真面目—诚实，与此同时，他讨厌什么事都不做，游手好闲。他自己也总是在做着什么工作。热心编杂志，给求他的人校订译稿。他说，最坏的是一个人什么事都不做，哪怕是尼禄那样的暴君，也比什么事都不做的人强。生在这个世上而无为是最无聊事了。”

# 秋 夜

《秋夜》是《野草》二十三篇作品中的第一篇。在这篇以象征性的手法来浓缩内心世界表现的作品中，作者做了竭尽全力的尝试。内容虽有些过盛，但展示着富有风格的诗的世界是确实的。

这诗章的确是若无其事地被写出来的。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不过，想想看，为什么不更简单地说“可以看见有两株枣树”，而偏偏要这样来表现呢？这就成了问题。据卫俊秀说，这在发表的当时颇唤起了读者的兴趣。即使着眼于此，也可认为曾产生过某种程度的效果（尽管李长之早就指责这是恶劣的趣味）。

不管怎么说，如此重复地叙述，是使“枣树”的形象更鲜明、更具有存在感，从而引起读者的注意。同时，分别表述两株枣树，也自然地表现了作者当时的“寂寞”与孤立感。当时，正是军阀统治的黑暗年代，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五四退潮期”的文化战线的停滞期，所以，作者也时而感到“寂寞”和孤独是不成问题的。

此外，鲁迅在这一时期的个人生活上，还有和一直是文学上的志同道合者——二弟周作人的失和问题。不称心的妻子同住在一起，和鲁迅“寂寞”感情的关联恐怕是在想象以上的。这也是不可忽视的要素。

接着，作者的视线离开了枣树，转向天空。